

《离骚发微》前言

魏 炯 若

《离骚发微》这一个题目，我原来的意思，是只想对从前研究《离骚》的人没有谈到的问题谈一谈。可是这些问题，既有关于内容的，也有关于形式的；加上《离骚》既是一种有机组合，就免不了牵一发动全身，结果就写成了一本讲解《离骚》的小书。可是又有一些问题是在讲解中难于详谈的，择要汇集，就作为《前言》。

一、《离骚》的写作时间

要对《离骚》作一点发微的工作，肯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先决条件。

屈原历史的权威资料是《史记·屈原传》。《离骚》本身虽是文学作品，也可以起到重要的旁证作用。

《离骚》的写作时间，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在楚怀王时被疏之后。二、在顷襄王时被放逐的前夕。根据都是《史记》。

《屈原传》谈及《离骚》的地方，分在两处。一处是在被疏后：

“王怒而疏屈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下面用“屈平既绌”四字，遥接“王怒而疏屈原”句，又继续叙述屈原的历史，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原既嫉之。”下面紧接着说：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下面又用“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一段话，遥接“屈原既嫉之”句，又继续写屈原的历史。

根据前面一段，或根据后面一段，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这两种说法，后者，即《离骚》作于顷襄王怒而迁之的前夕的说法，在近代几乎成了权威性的意见。但是，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传文“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明白地写在“王怒而疏屈原”的下面，这是前说的明确不过的证据。但在“顷襄王怒而迁之”的前夕，即“屈原既嫉之”的下面，只

是说“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并未提顷襄；而且《离骚》全篇，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死，也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以后，这又是前说的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据。

后说的主张者说，前后两处插叙，都是谈的一个《离骚》内容，只是分成两半罢了。这种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对为什么《屈原传》要把叙述《离骚》内容的话分开放置两处这一问题，还从来没有过满意的答复。须知《屈原传》的后一段插话，即“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一段，并非是以叙述《离骚》内容为目的。这一段的插入，是为了说明屈原作《离骚》想使怀王觉悟，由于怀王终不觉悟，才闹到“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前人误解了这一段话的内容，才产生一段话分开放置两处的错误认识，并又从而产生把《离骚》写作时间后移的错误。

持后说的人，还认为“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是“闻”屈原作《离骚》。但是如前所引，《屈原传》有关《离骚》的两段话，都是插入的。前一段后面紧接着的“屈平既绌”四字，是遥接前面“王怒而疏屈平”。后面一段之后，紧接着的“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也是遥接前面“屈平既嫉之”。这就很明显，令尹子兰所“闻”的是“屈平既嫉之”，而不是“闻”的屈原作《离骚》。

正确的屈原作《离骚》的时间，应当根据《屈原传》：“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句明确的话，定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不久。写作时间的决定，对于《离骚》的内容的认识有绝大关系。

二、《离骚》的内容、写作动机和效果

《离骚》的形式虽简单，内容却很复杂，概括说来，即第一、屈原向楚怀王解释他的政治主张和设施的用意；第二、这些政治主张和设施对楚国的关系；第三、控诉谗害他的“党人”对楚国的危害。这些东西，在《离骚》这部文学作品中间，就如金之在矿，玉之在石，待人发掘。

了解了《离骚》的内容，屈原的写作动机，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屈原由于刚刚被疏，因此才急于为自己辩解。第一、希望怀王能够保留他所建立的已经成为法令的政治设施，不要毁弃；第二、他培养了一批能够执行他的政策的人材，希望能够保留下来，作为楚国政治上的骨干；最后才是他自己。关于他自己，《离骚》里边谈得很不具体，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知道，他是希望留在怀王身旁，作为怀王的顾问的。

从《骚》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政治设施还没有被废弃，他所荐引的人材，也还没有被斥退，还有万一挽回的希望。这就是屈原写作《离骚》的动机。要是被疏已久，楚国的政治和人事已成新的定局，还这样喇喇不休地讲一些已成历史的故事，又有什么意思呢？再若是到了顷襄王时代，还在谈隔了一个时代的、三十年以前的事，甚至还在责怪某些人变了节，这就简直要使人骇怪了。

写作动机明确了，《离骚》的探微方向就出来了。

至于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谈：

第一、屈原作《离骚》的希望落空了。《屈原传》中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这就是落空的证明。司马迁的话，很明显是针对《离骚》后半篇欲往观四荒，又再三地推迟的情况说的，主要是在于说明屈原希望怀王一悟，使楚国“户服艾以盈要”的风俗来一个大改变。所谓“三致志焉”，也主要在后半篇。“虽放流”的“虽”字，应该解作“纵然是”，就是说即使把我放流，我仍然希望君能一悟，俗能一改。但是，怀王由于“不知忠臣之分”，分辨不出忠和奸、善和恶，终于“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第二、《离骚》描绘出了世纪末的楚国上层社会；同时也就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六国的上层社会。

表现世纪末最突出的是：“保厥美以骄傲，日康娱以淫游。”这种人像夏代的桀一样“纵欲而不忍”。由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就不免和周代的这类人一样，“且以喜乐，且以永日”（《诗·唐风·山有枢》）。

其次一类是：“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的人。他们主张画圆不用规，画方不用矩，也即是说，他们强说不圆的才是圆，不方的才是方；他们主张背弃绳墨，也即是说，直的不美，曲的才美。这一类人，敢为大言，妄图欺世盗名，变白为黑，错误地自认为可以横行一世。这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毁弃国家民族的一切宝贵财富的傢伙。

第三类人是：为了“贪婪”而“竞进”，为了竞进而“嫉贤”，为了嫉贤而“造谣”（造谣），又为了达到这一切而“好朋”。“好朋”，即是他们有一个上下勾结，左右串联，以达其贪婪目的的政治集团。

这种世纪末的现象，不仅楚国，实际弥漫于六国的上层人物中。控制政权，集中财富，谋害善类，弄得来民穷财尽，社会思想混乱，使得六国君主，都免不了和楚怀王同样的命运。从《离骚》中，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楚国（包括六国）破灭原因的第一手资料。

三、《离骚》的男女主题

《离骚》的男女主题，历来就引人注目。

汉朝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已经提出了这一点。东汉王逸在《离骚序》里说得更具体：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灵修、美人，以媲（比）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不过，刘安仅仅是提出了问题，王逸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这是比兴。对于男女主题这一点，却是存而不论。

楚民歌多是男女主题。《九歌》是祭神的歌词，尚且使用男女主题；《离骚》的创

作，发展了楚民歌，连它的男女主题一起吸取，一起发展，变男求女为女求男。宋朝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夫唯灵修之故也”下注说：

“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

看来宋朝人已经发现了《离骚》用女求男为比喻这一事实。

《离骚》女求男这一男女主题，用第一人称女。女自说：“自己既有‘内美’，又能‘好修（喜爱修饰）’”。并以这‘好修’的好习惯要求所爱的男子，为这男子设置“四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注：“奔走先后，四辅之职也。”），用来辅助并约束这男子的行动。可是，这个男子认为此女对他的约束（“鞿羈”），使他很感不便，因此，和此女争宠的其他女子的谗言，就得到乘隙而进的机会。她们进谗说：这女子的装饰太不时髦，画的眉又太妖淫（“蹇吾法乎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男子听信谗言，毁弃旧约，另结新欢（“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这就是《离骚》前半篇所叙述的基本事实。

后半篇说，这个被遗弃的女子，更重新整顿她所佩带的香草（即被人毁谤为不时髦的装束），准备去“往观四荒”，到全国各地去寻求和自己这种修饰主张相同的人。她的亲姐姐知道了，责骂她顽固，不能随和。这女子就去请求舜给她判断是非。舜的判断说，她所行的是“中正”。因此她决定出发去“往观四荒”。

可是，临行她又改变了主意，借口说天太晚了，要稍停一停，再作最后努力，希望挽回爱情。她去请了许多有名人物替她向男方疏通；可又全被争宠的人所阻挠，不得和男方见面。这一来，她已经是不得不走了。

可是，她又放心不下：竟自没有一个能了解她所主张的的美的标准的女子留在国内，因此想趁这时在下一代妇女中深入寻求一次。结果又全遭失败。

可是，她还不愿立即起程。她想，自己本来就是不忍离开楚国的，但是周围环境又实在难于忍受。怎么办呢？人事已尽，且听听天命吧！就去请巫师灵氛替她占卦，请求神为他决定出国去是否吉利？灵氛占了卦，说：“吉”！

可是，她仍旧在犹豫。灵氛为了使她相信，又替她降巫咸神。巫咸神被请了下来时，所有的天神都一齐下来了，从光闪闪的中间发出声音，告诉为什么吉的缘故。她在神灵的感召之下，自己也作了反省：风俗已经大变，自己既不愿放弃自己的美的理想去迎合不合理的风尚，留在楚国也就毫无用处。经过反省，才最后下了决心，准备远行。

准备好粮食和车马——《庄子·逍遥游》说：“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拟定了所走的路线，派出了打前站的人马，告诉他们，到指定的地点等待。自己则在饯行的筵宴上，听歌看午，以消遣离别之忧。

最后上路了。驾着八头龙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乘着有画云的旗帜的车子飞上了太空。这时，御车的仆夫在悲哀，驾车的马也在怀恋故土，仆和马都蹒跚着头，去回望那将要与之永别的家乡，忘了前进。

这就是后半篇所表现的，屈原再三不忍离开生长自己的楚国的感情。

《离骚》由于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兼之正喻夹写，很不易理出一个线索。而男女主题就是一根自然的线索。理着这一条线索，文章的结构、内容，正喻夹写的方法，以及后半篇的“翻空”“出奇”，都可以收到振裘挈领的效果。

四、《离骚》的名义

《离骚》这个命题的含义，主要的说法有二。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见《楚辞章句》附录）。

《史记索隐》引应劭曰：“离，遭也。骚，忧也。”这是误以班固说强加于司马迁。王逸《离骚序》说：“离，别也；骚，愁也。”这个解释和司马迁是一致的。古代人训诂的成例是，常训不加解释。司马迁只解骚字，就是说离字是离别的常训。《离骚》说：“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教化！”上句言离，下句言忧，这就是屈原在文章中自己点题。离别楚王之忧，既概括了《离骚》全文，又突出了屈原自己的写作动机。

班固训《离骚》为“遭忧”。“遭忧作辞”，就仅限于抒写一己的穷愁。这只能是班固本人的思想。他先这样曲解题义，然后就根据他的曲解来提出批评，说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离骚序》，见《楚辞补注》）。班固这一论点，也有根源，那就是汉朝扬雄的《反离骚》：“知众嫫之嫉妒兮，何必扬纛之蛾眉”（嫫，美貌，音户。纛，枉死之名，音雷）。这是秦汉以来封建权力愈集中，统治者愈成为不可触犯以后的思想反映。屈原作《离骚》，使人讽诵（《文选》五臣注、刘良有此说），意思当然在于使王闻之。楚怀王在当时，并没有感到触犯，而汉朝的扬、班二人却感到了触犯，可知他二人的思想是够不上了解屈原的。而屈原所斥责的“壹凿正衲”，“周容为度”，却正是他们这样的人。

近代有人解《离骚》为“牢骚”，就意义的内涵看来，还是属于班固说的一系。

五、《离骚》的源和流

《离骚》的艺术形式来源于楚民歌，这是毫无异议的。不过民歌都是小唱，被屈原扩展成了大篇。

至于内容，我认为应出于周诗中谈政治的雅诗。淮南王《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就是说的《离骚》出于周诗。《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这首诗是《诗经》三百篇里所没有的逸诗。《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答楚庄王问教育太子的问题，就有“教之诗”的建议。可以知道楚王的上代就曾经用诗教太子。不过所教的诗，当然不是现在看见的周诗三百篇，不过周诗也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楚国君臣都重视周诗，确有踪迹可寻。

屈原镛铸楚歌与周诗而自铸伟辞，这是《离骚》的源，但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源，这就是屈原生当秦国国力上升、六国国力下降的大转变时期，又亲身经历了楚国政治社会大动荡的剧烈斗争。《离骚》描绘了此一斗争，从而显现了楚与六国之所以衰落、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从历史总结中展示出国家兴与亡之不同的道路，明示楚国前途的两种选择。其论据虽限于封建及其前之社会现实，然以善于总结之故，其意义乃更广大。

屈原以后的作者，例如宋玉，在技巧方面未始没有发展，而于内容，则不免“量凿而正枘”或“保厥美以骄傲”。司马迁在《屈原传》里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也即是谈的这一情况。《楚辞》这一文章体裁，竟自成为屈原一出，即至高峰；屈原一死，渐入衰亡。主要的原因，只怕在于封建统治愈巩固，文人的思想水平愈下降。高峰在前，后无可继，自然就只有走向衰亡。

六、《离骚》的形象思维

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梁朝的刘勰认为“比显兴隐”，即是说：比、兴在运用形象以表达作者思维方面，是相同的；只不过一显一隐，因而有了不同的两个名称罢了。

在《诗经》这部东周时代（前770—256）的诗歌总集里，比兴已大量出现（所传周代以前的诗不尽可靠），到《离骚》达到高峰。《离骚》全篇，纯用比兴写成。前文“男女主题”一章，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情况。《离骚》的后半篇，把千愁万恨只是为了楚国这一点意思，用形象的手法描述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篇大作。

这里只准备谈一个“美人”、“香草”的比兴问题，和一个“奇正还相生”的正喻互换地位的问题。

“美人”一词，在《离骚》只一见。自汉以来都说是比喻君主；细察文理，实际是屈原自指（近人刘永济《楚辞通笺》也持这一论点）。前人所谈“美人”。“香草”的美人，可能是指的宓妃、佚女之流。这里就只谈“香草”。

《离骚》里显现的屈原形象，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头上戴的是香花所制的岌岌高冠，身上披的，腰间佩的，全是香草香花。事实上还不止此，他饮的是花露，食的是初开的菊花，连拭去泪痕用的，也是香草。

“扈（披上）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初开的花）。 ”

“览茹蕙以掩涕兮。”

饮露餐英，意思在“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颀颀亦何伤。”只要保持思想感情的美好，饿得面黄肌瘦也在所不惜。茹蕙掩涕，表示虽在最痛苦时也不离开所坚持的道德标准。虽是凡香草都代表了屈原的美好理想，但穿在身上的和佩在腰间的，在文中出现得最多，从而知其重要。像扈离纫兰，就代表了屈原的“修能（态）”。这个道德的范畴，包括了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各个方面。屈原是把它看作小之个人的人格修养，大之社会风俗的改变和国家政策方针的正确和完善的重要基础的。

因此，屈原就用它来贡献给怀王：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芷。”

他还劝怀王要“抚壮弃秽”。壮是“及余饰之方壮”的壮，指的是枝叶茂盛的香草。这些都是指的人材。

他又用来赠送朋友：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这指的是政策方针。

屈原又亲自动手培植这些香草：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屈原所穿着和佩带的香草，又不断地随时都在增加新的品种：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阶之木兰兮，夕揽洲宿莽。”

他每遇到一次挫折，就一定要检查一次他的“修态”：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每有新的行动之前，也要检查。在“将往观乎四荒”的时候，他说：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对他所培植的“众芳”也要检查：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观察人物，也用这作为标准：

“人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这个“修能”，也就是“众芳所在”的法则，都是楚国先贤彭咸的遗则，是楚国土生土长的东西：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这就是屈原《离骚》的美人、香草的比兴内容。但是《离骚》的比兴，形象远比美人、香草为多，其运用的手法，也远不是这样的简单。它无论叙事、说理、抒情，全都运用比兴方法；而运用起来，奇正相生，千变万化，使人目迷五色。

《史记·田单列传》中说：“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意思是和敌人对阵时，侧面忽然转变成为正面，正面反而成了侧面，使敌人不测。文章也有这样的情况：看来是正面意思的，却是比喻；看来是比喻的，却又是正意。以《离骚》为例：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颛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看来这一段的“众芳”“蕙茝”等，应是比喻，尧舜、桀纣才是正意。但若理着男女主题的线索来了解这段，恰恰众芳、蕙茝是正意。这里是引尧舜来比喻“众芳所在”的修饰方法是正确的，而桀纣连衣服都不穿周正（王逸注：“猖披，衣不带之貌”），则是错误的。

“启九辩与九歌”一段，也是这样：启、五子、羿、浇、桀、纣用来比喻屈原所不愿佩带的恶草；而汤、禹和周，则比喻所佩带的香草。灵氛占之以后，屈原自己在考虑形势：“人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又全从修饰这一正面的意思来说。不过这个正面，从《离骚》的内容说来，恰是比喻。

《离骚》的比兴手法中，这一“奇正相生”的写法，就好比磨成了千百个面的一颗宝石，面面互相折射，使观察它的人耀眼欲花，很难看清楚它本来的形相。《离骚》的难读，这也是其一个方面。后来《文选》的《设论》一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都继承了这一“奇正相生”的写作手法。

七、《离骚》的局限

屈原是历史上的伟大文学家，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可是，他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

“才高者苑其鸿才，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这个论断的缺点，在于仅仅停留在《离骚》的形式一面。他在“赞曰”里说：“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是内容和形式两面俱到，却又把内容放在第二位。好像他所承认的，只是《离骚》的艺术一面。其实，这正是他《辨骚》辨字的深意。

历来的文学评论家，多是表面的艺术第一，而实际的政治第一。他们对于反对封建统治的作品，一概排斥，这难道还不是政治第一么？

至于屈原，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司马迁在《屈原传》里也是这样认识的。

屈原的政治理想，具见于《离骚》。他继承古代合理的政治思想：如尧舜的“耿介”（光明正大）；禹、汤、文王的“纯粹”（“众芳所在”，举用一切有德有才的人才）；他的“好修”（政治上首先要约束自己），又来自楚国的先贤彭咸。

屈原政治思想，表现在外交上的，是联齐抗秦。联系到怀王为“纵约长”，率领九国联军去“扣关攻秦”来看，只怕屈原的联齐抗秦，不会仅仅是为了楚国的自保，而是要和秦国逐鹿中原。苏秦说楚王，曾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张仪说楚王时也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苏秦的合纵，是联合六国攻打秦国的；张仪的连横，是要六国去朝秦国的。既是敌对二家都这样说，可知当时秦楚争王，势均力敌，本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屈原对待楚国和秦国争天下的政治措施：首先是约束楚王，要他忍欲，要他“哀民生”，“察民心”。这正是针对着秦国“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杜牧《阿房宫赋》）的。“耿介”针对着秦的高诈力；“从芳所在”，针对着秦用六国人材。要是怀王真的能按照屈原的主张做去，只怕争王的局面，确实是“未知鹿死谁手”。司马迁在《屈原传》末说：“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屈原是关系楚国生死存亡的人物。

屈原是在政治上碰了壁，然后才想用文学来推进他的政治的。其一，屈原的《离骚》是以政治为核心的，而历代评论家却只看见了他的艺术外壳；其二，《离骚》表现屈原一心为楚，宁死不离开楚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了风俗习惯。可是屈原却用“自沉汨罗”来转变这一习俗。

《离骚》后半篇，不是说他要“往观四荒”吗？这一点，应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离骚》是文学作品，它形象地说明被疏之后的心情；也即是说，他的思想上天入地，全是为的楚国，因此他不能离开楚国。

第二，他要向楚王说：我不是不能像其他许多的人一样，到外国去寻找自己的发展前途；只是不愿离开楚国。

“怀石自沉汨罗”这一惊天动地的事实，对当时社会的震动很大！从此以后，“南走胡，北走越”就成了贬义，而为人民所唾弃。

屈原“沉湘”，本是要警告楚国的统治者：亡国就在眼前。这一目的是失败了。但其另一目的——对战国游士毫无祖国观念的抗议，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主要是由于人民的拥护。知识分子哪怕再自私，也总不能不顾虑千百万人的指摘。“千人所指，无病自死。”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群众的威力。

屈原政治第一的作风，死不离楚国的气节，都不能构成他的局限。

问题倒是在于，屈原所忠的对象是谁？

屈原不是不知道人民对楚国的重要；但人民在他的思想里，只占第二位。屈原所终身怀念，且为之沉湘的是怀王。怀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军事方面说：首先，怀王作为纵长，去叩关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汉朝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作过研究，他说：当时的战国四公子都是贤相，所有谋臣、勇将，都是第一流的；但却闹成了个不战自溃。看来很显然，薄弱环节就是这位纵长。其次，张仪骗他“绝齐交”，许割“商於之地六百里”，后来只承认六里。他一怒之下，起倾国之兵去深入击秦，而没有顾虑到韩魏二国的乘虚进攻，结果弄得楚军从秦国狼狈退却。这两件事说明楚怀王的军事知识等于零。

从政治方面说：他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和他的幼子子兰；贪六百里土地而受欺于张仪；用汉中地换一个张仪来泄愤，却又因宠姬一句话就放走；张仪走了，又因屈原谏诤派人去追。这些都说明了，楚怀王简直不懂得政治是个什么东西。

从外交方面说：合纵时髦他就合纵，而且要当纵长；连横时髦他就连横，而且对连横的倡导人张仪言听计从，也不管张仪是在替谁办事。他只知道赶时髦。国家为什么要搞外交？外交该干什么？他完全不懂，也不打算去懂。

这真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昏君！

屈原知不知道呢？看来知道：“怨灵修之浩荡兮”，浩荡，即周诗：“荡荡上帝”的“荡荡”。郑玄《毛诗笺》说：“荡荡，法度废坏之貌。”又像《尚书·尧典》：“荡荡怀山襄陵”的“荡荡”，说它冲毁了一切。屈原在怨怀王时这样说，那就相当于说：“你真的是有点昏聩！”

屈原既然知道怀王是一个昏君，为什么又对他这样恋恋呢？

第一，可能因为怀王是他的知己。《屈原传》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像这样，把内政外交都交给屈原，确实像个知己。而用知己的感情讨论国事，这在《离骚》的光芒中，未免是一颗黑子。

第二，是因为“国无人”。《离骚》说：“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我们试看，自怀王以后，顷襄王就更不如怀王，也就可以知道屈原的“瞻顾”与“沉湘”，都似乎是势非得已。

屈原又是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恩怨呢？封建社会，自然不会有纯然的大公，不过屈原之对怀王，却也不是纯粹的私恩。《离骚》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骚》之可贵，即在以国为重；不过国和君在思想上不能加以区别。这不仅屈原，封建社会的人，一般都是这样。仅能在他们中间发现一些彼胜于此，即有的带进步性，有的不带进步性。其所以分别的界限，齐晏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

怀王被不讲信义的秦国劫留，要求割地，而他却能“怒不听”！算是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比之卖国、割地、当儿皇帝，一切不顾，但求生存的人，就觉得楚怀王总要好一些。

人民是最准确的历史判断者。“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世家》）。怀王就由于有这么一点国家观念，因此尽管他做了不少昏聩的事，楚人还是要“怜之”，屈原也就要“眷顾”，而且也值得眷顾。

不过，楚国除去怀王，是否就绝无可忠之人了呢？这一点，屈原是回答不了的。因此，把屈原放在特定的历史地位上来看，他是进步的；但从人民的角度看，他的局限却很大。其根源在于他的出身。

屈原是楚国的大贵族，是代代相传几百年的世家大族的一员。《离骚》在“历吉日乎吾将行”之下，说到：“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轸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除去文学夸张的成份，屈原出行时的随从车辆，总不会少于百乘。若是按照周代人的算法，千乘之国就有百乘之家，那么像楚国这样不下于万乘的大国，有千乘之家也不是不可能的。楚国的昭、屈、景这三大姓，经受了楚国被灭亡这样的大事之后，又经受了陈胜、项籍灭秦和楚汉相争的两次大战，到汉高帝九年，历史记载：“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史记·高祖本记》）。即是说，汉高帝时，屈氏都还是楚地的大姓豪强，足以威胁汉朝的地方安宁，因此迁徙他们到关中。那么，在全楚时，屈姓的实力强大，更可想见。楚国的莫敖，职位仅次于令尹（宰相），相当于周制的卿（见桓公十一年《左传正义》）。《左传》所载，楚国作莫敖的人，全是屈姓，可知屈姓是楚国的世卿，所以才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时间族姓不衰。

从屈原的官职看，司马迁说：“为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说：“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文选·报任少卿书》李善注，引作“为楚怀王左司徒。”《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孙叔敖筑沂城”，使管理筑城的封人作计划，“以授司徒。”杜预注：“司徒掌役。”司徒是掌管征发百姓服劳役的官。不见有左司徒或左徒。《史记·楚世家》说顷襄王“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待太子于秦。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黄歇由左徒为令尹，则左徒亦楚之贵臣矣。”意思好像认为，左徒距令尹不过一、二级。这一推理不够准确，因为太子到外国去当人质，没有必要派遣本国的二、三号人物作侍从。楚国左徒这个官的地位高低，暂时无法推测；张守节《史记正义》用唐代的左右拾遗相比，或许相近吧（《新唐书·百官志》：

“左拾遗从八品上，属门下省”）！《史记》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看来这并非是左徒的职任，而是出于楚王的特殊信任。汉朝王逸的《离骚经序》说：“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看来是掌培养楚贵族的接班人的职务，也还

是一个地位不高而任务很重要的官职。

既然屈原的官位并不高，那末，“屯余车其千乘兮”，就不是由于他的地位，而是由于他的家族关系。

《离骚》戒王纵欲，而屈原的自叙，却极端地豪华，难道能说全是文人的夸张！夸张倘若离开了现实，那就会成为笑料。其实对屈原的这些自叙感到难解，或作别解，都是以后世平常人的眼光去观察战国贵族所产生的误解。屈原戒纵欲，并没有戒奢。看管仲的事就可以了解。齐桓公要去封泰山，管仲加以阻止，因为那是纵欲；而管仲自己却有“三归之家”。三归，据说是所游之处，钟鼓帷帐以及职事人员，都不移而具。这在当时的贵族社会，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寻常事，毫不足怪。感到奇怪，乃是由于不了解屈原的贵族身分所造成的。

屈原准备出国游于诸侯。《离骚》说：“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这是屈原的先遣人员。“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这是屈原出行所携带的乐队。

战国游士，像苏秦，大约是出身素族吧？可是他前往秦国游说时，穿的是“黑貂之裘”，行装里携带着“黄金百斤”。春秋末期的孔丘，不过是个破落贵族，当他将要往卫国去时，也是“先之以子贡，又申之以冉有。”可见这又是一时的风气，连达不到标准的人，也需要硬着头皮去赶；何况原本是楚国大贵族的屈原，行游诸侯时，能不显出身分，而去自己坍台么？

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历聘上国，每到一国，都和最高一级的人士会见，并讨论广泛的政治问题。当时的吴国，还是所谓蛮夷小国。屈原是楚大国的大贵族，其声势自然就更要震惊一世了。因此灵氛之占才说：“孰求美而释女(汝)。”意思是：只要屈原肯去行游诸侯，一定会有遇合。

但是，屈原为什么要在《离骚》里面描写这些？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屈原在被疏之后写出《离骚》，前半篇为自己的政治设施包括对怀王的约束辩解，意思是要使怀王知道，这是一个使他成为禹汤文武的道路。后半篇，说他在楚国呆不下去了，将去“往观四荒”，在这中间铺张一下出国时的声势，看来想使怀王想一想要是自己接待这样一个贵宾将怎样对待，从而促使怀王反省疏远自己是否应该？

屈原出生于一个有传统势力的大贵族家庭，本身又由于“好修”，这就使他在世纪末的楚贵族中间，成了群鸡中的一只白鹤；再加上他的一套能孚众望的政治理想，因此使他成了楚国希望的寄托者。

楚怀王那样破格任用屈原的原因是什么？是像齐桓公那样认识管仲么？不是。从他那么轻易地疏远屈原，就可知道他对屈原并无认识。很可能是，屈原在当时人望很高，因此获得怀王的任用。《离骚》中的“鸾皇”“凤鸟”“灵氛”“巫咸”，就代表了那一批属望屈原的耆老重臣。在怀王面前一力推重屈原的，就是这些人。所谓“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就是指的这些人已经不再受重视，说的话也不起作用了。怀王死后，“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嫉”他，就急急忙忙地把屈原放逐到荒无人烟的江滨去。为什么？很可能屈原在当时

是个很有号召力的人物。放逐他，即是不许他继续在群众中发挥影响。

屈原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汨罗江在当时又是极其荒僻的地方。一个人在这样荒僻的地方投水死去，会震动全楚，其震波甚至冲决时代的堤防，在楚灭亡之后还不停止。这不能说是仅仅由于他那一死，也不会是仅仅由于他写过《离骚》这样的伟大作品，看来他在楚国的政治方面能得人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必须指出：在当时的楚国社会，使得屈原在楚人眼中成为希望寄托者的应首先是他大贵族的家庭出身。因为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可能过问楚国的政治。

不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左徒或三闾大夫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甚至还“造为宪令”，“滋兰九畹”？又为什么会“屯车千乘”，并且“奏九歌而舞韶”？后人理想中的屈原形象，也即是历代画家笔下的屈原形象，都是“被发行吟泽畔”时的屈原形象。那是后代失意的知识分子，按照自身情况去想象的屈原。按照这种想象去理解屈原，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

屈原贵族阶级的烙印，在《离骚》中是有反映的。

屈原谏楚王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似乎对各种香草一视同仁。可是到他栽培香草的时候，却优先兰蕙。这难道是香草本质的差别么？只怕是兰蕙代表了王族。

其次，“众芳芜秽”，然而屈原却说：“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似乎深深寄托希望于椒兰，而揭车、江离为不足道。从楚国政治局势来看，自然是贵族，尤其是王族，取得执政权力的希望最大。但又怎么能说这不是阶级烙印的反映呢？

第三，“相下女之可诒”的下女：宓妃、有娥佚女、有虞二姚，何故全是贵族？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在屈原身上是不会例外的。

由屈原的阶级意识出发，对于封建的诗教，不管他有意无意，总是会自然合拍的。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什么是“诗人之义”呢？那就是《礼记·经解篇》所记孔丘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离骚》的“乱曰”，重点地提出“国无人莫我知”与“莫足与为美政”。但是在篇中，却只是正面发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虽也对“竞进”“贪婪”等政治上的歪风有所揭露，但主要并不在揭露。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赞美《离骚》说：“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翻一翻《小雅》里的刺诗，都是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离骚》是一个类型。孔丘把它总结为“温柔敦厚”四字。屈原未必学过孔家的教导，但他的《离骚》却和这个封建诗教不谋而合。刘勰的《文心雕龙》说：“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按这个说法，就是《离骚》的温柔敦厚还胜过《小雅》，难怪汉宣帝“以为皆合经术”（《文心雕龙·辨骚》）了。尽管《离骚》的价值远远不是《小雅》所能相比，但它的阶级烙印还是应该指出的。

《离骚》的“乱曰”，劈头就感叹：“已矣哉！”实际和《诗·卫风·氓》和《陈风·北门》的“已焉哉”一样，并非表示决绝的词语，只不过表示深深的失望罢了。

（下转14页）

那末，我们的文艺就必须深刻地反映这个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创造条件的斗争过程。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辛勤的劳动，艰巨的甚至十分激烈的斗争，充满了这个创造转化条件的过程。大庆人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精神充分表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既洋溢着革命的英雄气概，又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要揭示出这个创造转化条件的斗争的理想源泉，表现这个斗争中的理想光辉。在这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就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充实，互相升华，成为浑然的整体。这样，就既反对了那种只看见现实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而忘记甚至否定了理想的倾向，也反对了那种用抹杀现实斗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来把革命道路“浪漫蒂克化”的倾向。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毛主席坚持和发扬了唯物辩证法这种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以雄伟的气魄和雷霆万钧之力推动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互相转化的过程。这一伟大过程反映到文艺中来，也就必然有力地推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上接64页）

《离骚》作于怀王见疏之后，司马迁解释它的内容是“不忘欲反，三致志焉”，又说是“幸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班固、王逸认为是“讽谏怀王”的作品。这些都是正确的。《离骚》的内容，和楚王斗，是“冀幸君之一悟”；和“党人”斗，是望“俗之一改”。后半篇千迴百折写自己的思想斗争，还不是为了取得楚王的重新信任！不过从整个看来，他是为了楚国的前途而斗争，因此这篇作品终于突破了个人小圈子而成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只是，一切事都不会那么干脆，在为楚国这个大前提中间，为怀王、为知己这样的消极因素，仍然不能排除。

司马迁在《屈原传》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提出“怨”字，说《离骚》是“怨”的产物。屈原自己在《离骚》里也说：“怨灵修之浩荡。”从《离骚》全文看，怨的气氛是很浓厚的。因此，几千年中的封建文人，凡失意者，无不感到《离骚》和自己共鸣。由于封建社会的不平等，随处都在制造民“怨”，文人所表现的，只不过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所以孔丘没奈何，只好承认“可以怨”（《论语·阳货》）。社会主义社会，比起封建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普遍树立以前，《离骚》的“怨”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的。这也是《离骚》的局限。

总的说来，《离骚》的局限，都是时代的、阶级的，这是一般性的；关于特殊性的，那就是积极因素之中，含有消极因素；消极因素之中，又孕育着积极因素。“观过知仁”，从探索屈原的局限的过程中，使人更感到屈原还是一个应该充分肯定的人物。